

贺龙骨灰安放的曲折经过

1964年,贺龙、罗瑞卿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全军开展了大比武运动,这与林彪的“突出政治”提法大相径庭。罗瑞卿被打倒后,林彪公开煽动“贺龙搞大比武,是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文革期间,权势倾天的林彪开始向贺龙下黑手了。

周恩来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致悼词



住处曾被停过45天水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公然诬蔑贺龙“是个刀客,到处伸手夺权,搞颠覆活动”。8月下旬,林彪一伙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直指贺龙。江青到清华大学等处活动,她在群众大会上鼓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此后,在不同历史时期和贺龙共过事的许多同志都遭到了审查。1967年1月,红卫兵小将疯狂地冲入东交民巷贺龙的住宅抄了贺龙的家。1月20日凌晨3时,周恩来派专车把贺龙夫妇秘密迁到了京郊西山玉泉山下的卧佛寺象鼻沟一棟平房里住下。

2月中旬,林彪一伙指使两个人分别写了一封诬告贺龙的信,林彪、江青利用这两枚重磅炸弹蒙蔽了毛泽东,“贺龙专案组”最终成立,西山的贺宅重新处在严密的监视中。监管人员对贺龙夫妇的迫害变本加厉:他们曾被停过45天的水源,每天只定量供应一小壶水;两年中贺龙只有

两套衣服可供替换;贺龙的糖尿病日益恶化却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

1969年6月,在西山被监禁2年多后,贺龙的健康每况愈下。6月8日,贺龙听完广播后不断呕吐,出现了糖尿病中毒现象。整个白天,在薛明的多次催促下,只有一个医生给贺龙打了一剂“吐吐针”。又经过5次催促,到晚上8点才来了两个医生。他们给贺龙分别吊上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药水瓶后,便匆匆地接受“指示”去了,危害糖尿病患者生命的葡萄糖整整输了一夜,共2000CC。6月9日,医院来了医生,强制贺龙去301医院“治疗”。

贺龙8时55分入院,由于多方阻挠,医生于10时25分才开始给他进行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降到70/40。11时30分,一位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并组织抢救,但那个秉承邱会作旨意的医院负责人,不顾贺龙病情危急,拖了两个小时后,才于下午1时30分同意开始会诊。会诊只允许“背靠背”地进行,医生见不到病人,只能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单和x

光片来讨论病情。由于时间一拖再拖,尽管在场的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一切已无济于事,贺龙于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含冤去世,时年73岁。

贺龙逝世后,北京卫成区的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薛明,要她到医院核实一个材料。到了301医院,薛明才得知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贺龙的3个子女也被通知来到医院,他们搀扶着薛明,经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来到第14病室,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

遗体被神秘火化

1969年6月9日晚,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出,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车上的工作人员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灵车上只有驾驶员张克安和八宝山殡葬处的副处长彭志刚、火化厂副主任王锋,三人都是党员。那时,凡是执行此类政治任务的人,首先政治上要绝对可靠,组织观念要强,嘴要严,同时业务上也要熟练。

灵车开到西单路口,向北拐弯后经甘石桥来到缸瓦市,

最后开进了兵马司胡同。执勤战士查验了三人证件后,彭志刚和王锋从车上取了担架和张克安一起迈进了大门。进了西屋,贺龙遗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三个人谁也没说话,把贺龙的遗体轻轻地从床上抬到担架上,向屋外走去。他们把贺龙遗体送入灵车后部,随即进了车,几个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灵车在前后两辆军用吉普车的“保护”下向八宝山开去。

已近子夜12时,灵车刚在八宝山火化车间的门口停下来,吉普车便一左一右“保护”在两旁。在军人命令下,彭志刚等三人把贺龙遗体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军人随即下了逐客令,三人退出。这类政治任务为了保密起见,各业务环节的人是不让互相照面的,接尸的、火化的、收骨灰的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不准互通信息。火化的人不知道是谁接的尸,烧的是谁;收骨灰的人不知道是谁的骨灰,什么时候烧的;接尸的人不知道是谁烧的,骨灰存放在哪里。负责安排的人可谓用心良苦。

火化车间的刘占海(党员)已在岗位上等了好几个小时。他在几个军人十几只眼睛的注视下,按动电钮把轨道车调到炉口后,回头看了看负责的军人,那人肯定地点点头。刘占海就把轨道车送入炉内,车子自动打开,尸体落在坑面上。由于炉子白天烧了一天尸体,这时炉温还很高,尸体一进去便燃起烈焰,裹着尸体的白布燃起了橘黄色的火苗。火焰严实地包围了贺龙遗体,刘占海根本看不清炉内是何人。凌晨1点多钟,刘占海打开炉子的出灰门,把一块块雪白的骨灰放入了军人们提供的白色骨灰袋中。军人把骨灰袋扎好放入车内,驱车消失在夜幕中。

6月11日,两个军人来到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他几栏都是空白,他们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于是,业务人员就给他们办理了存放证,骨灰盒的号码是34号。

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员把军人引入地下室,按指定号码把骨灰放好。工作人员见这个骨灰盒是最廉价的一种,价值仅7元,因而揣摩死者可能是个平民百姓。

总理抱病参加骨灰安放仪式

1975年6月初的一天,八宝山业务科来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一个是军委办公厅的石科长,另一位中等身材穿一身蓝色中山装的人是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同志。两个人要求业务科的工作人员赵德路带他们到老山骨灰堂去认领一个骨灰盒。进了骨灰堂大门,中央专案组的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骨灰证给赵德路,要其按证取盒。赵德路接过写有姓名为“王玉”的骨灰证,跟随工作人员刘春生走向了骨灰堂的地下室。

刘春生熟知每一个骨灰盒摆放的大体位置,他径直来到西边一排贴墙竖立的骨灰架前,又看了一下骨灰证上的号码,弯腰从架子最底层取出一个骨灰盒交给赵德路。这个骨灰盒上面连张照片也没有,蒙了不少灰尘,刘春生碰过的地方清晰地留下几枚指印。

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贺龙的骨灰盒取出来后,就在礼堂一室设立了灵堂,骨灰放在靠东墙的地方,西面安放贺龙的一幅遗像,四周摆放着数个花圈和几盆鲜花。军委办公厅和安葬处的几位领导轮流守灵。

上午10时许,参加安放

仪式的300多位领导人陆续到来,他们当中以老将军居多。鉴于周恩来已患病住院,身体虚弱,中央没安排他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但在仪式开始前,人们突然接到通知说周总理已抱病从医院过来了,让仪式推迟一下。

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走进第一休息室,屋里的领导人见到周恩来,都站起身迎接。叶剑英上前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问:“总理,您身体不好,怎么出来了?”周恩来点点头,疲倦的脸上现出一片悲哀:“我已经对不起贺龙总了,这次我哪能不来!”周恩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在签到簿上勉强地写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手抖得厉害,他签的字像无数个珠子串起来一般。

叶剑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本准备由他自己致的悼词递给周恩来,请他来读这项工作。周恩来接过悼词,掏出笔逐句逐字地审看着,不时地作一些小的修改。

骨灰安放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缓步走到话筒前,扫视了一眼大厅里的老同志们,慢慢拿起悼词,声音哽咽地念道:“同志们……”他拿着薄薄的一张讲稿,像举着千钧重物一样手抖个不停。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赞颂他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宣布向贺龙致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当人们抬起头时,惊异地发现周恩来再次向贺龙遗像弯下腰去,他连续鞠了7个躬。

仪式后,贺龙的骨灰盒安放在骨灰堂一室正面右上侧81号的骨灰匣里。此时,共和国元帅中已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位的骨灰先期安放到这里。在这里,贺龙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受到后人的瞻仰、怀念与追思。

程世刚 据《党史博采》

女经理出轨酿苦果 黑婴儿泄露一夜情

2007年初的一天,鄂中汉江边某市第一妇产医院住进了一个普通的孕妇。

住进医院的第九天,在分娩前的阵痛中,她被护士推进了产房……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响起,筋疲力尽的她周身涌起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她极力抬起头,刚看到那个小生命,她的上半个身子就蓦然僵住了,好大一会又重重地跌下去。她一把拉过被单捂住脸,低沉地痛哭起来……

就一眼,她已经真真切切地看清了,那个刚从她体内分离出来的小生命,浑身黝黑,高颧骨、深陷的眼窝、突出的嘴巴,完全是一副非洲黑人的模样。

酒后留宿客人房间

吉晓箐的婚姻曾让许多人羡慕不已。她长相甜美,身材高挑,在这个市唯一的一家涉外三星宾馆做客房部经理,她的丈夫潇洒俊朗,年轻有为,在当地一家规模较大的外资企业当高级管理职员。两人的薪水都比较高,家庭富足,生活优裕。唯一遗憾的是,两人结婚两年一直没有孩子,到医院检查,问题出在丈夫身上。医生说

他的精子成活率低,让妻子受孕的几率比较小。

起初,夫妇两对此并没十分在意。心想,现在两人都还年轻,等过段时间再看看。时间一晃就是两年多。其间,和他们差不多同时结婚的夫妻都先后开花结果,喜得爱子千金。每当周末和节假日,看到别的夫妇牵着活泼可爱的孩子上街、游园,吉晓箐夫妇就感到冷清和落寞。夫妻间感情的热度开始降温了,少了体贴和温柔,多了埋怨和无名火。本来还算开明的婆婆因为长时间抱不上孙子,把责任归咎于吉晓箐,经常说风凉话,翻白眼,而丈夫对此往往是视而不见,态度暧昧。

吉晓箐感到委屈和孤独,有时干脆找借口在宾馆住上一夜不回家。

正在这个时候,宾馆住进了一个非洲客人,30多岁,1.8米的个头,黝黑的皮肤透出一种别样的健美结实。他系统地学习过汉语,普通话讲得十分流利,自称是该市一家有名的外资企业请来解决技术难题的。吉晓箐接触这位特殊客人的机会很多,因为宾馆内部有规定,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像这类特殊客人的服务工作必须由客房部经理亲自负责。

吉晓箐为这个黑人住客整理房间,打扫卫生,端茶倒水。她热情而周到,规范而细致,令客人十分满意。同时,她娇媚的面容,以及东方女人迷人的风韵,在客人内心深处荡起爱的

涟漪……

仅仅几天时间,两人就像故交老友一般熟悉了。客人没有公务时,常常找借口把吉晓箐叫到房间聊天,给她讲一些域外民俗风情,生活趣闻。晚上他邀她去舞厅跳舞消遣,还不失时机地送她一些精致的小礼物。两人的关系由此越来越亲近了。

一夜风流后怀有身孕

眨眼间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客人告诉吉晓箐,他已完成任务,准备明天离开此地。当晚,他让餐饮部把丰盛的菜肴端到他的房间,拿来红葡萄酒,邀请吉晓箐共进晚餐。他说,两人天各一方,不同种族,不同肤色,此生有幸相见,实属难得,在一起吃顿饭以示纪念,同时也是对吉晓箐无可挑剔的服务表示感谢。

吉晓箐不便推辞,也无意推辞。晚上,吉晓箐如约而至。这是他们宾馆最高档的客房,金色的落地丝绒窗帘,橘黄的壁灯,宽大的西式床等摆设,营造出温馨浪漫的情调。

吉晓箐与客人相对而坐,在高脚酒杯频频的撞击中,一杯杯葡萄酒喝了下去。渐渐的,两人的眼睛有些迷糊了,说话声音小了,言语失常了……

当夜,吉晓箐没有离开那个浪漫的套间。当她清醒过来时,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翌日,那个特殊的客人悄然离开了小城。吉晓箐的生活又回复了原貌。时隔不久,她

感到自己的身体似乎有了变化,而且当月没有来例假。吉晓箐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吉晓箐有些不知所措。她惊惶地想,是不是那次与那个异国客人一夜风流种下了孽种?不过只一闪念,她就在心里否定了:不至于仅一次就怀上了,更何况他们还不是一个种族呢;这孩子肯定是丈夫的,虽然医生曾说过丈夫让她怀孕的几率低,但也是有可能的呀。于是,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

黑婴降生丈夫离她而去

吉晓箐终于有了喜了,丈夫和婆婆对她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出门进屋温言软语,问寒问暖,笑脸相对,家务活再不让她插手,日常生活也安排得丰富多彩。随着她临产月份的临近,这种关爱和照顾更为周到细致。

可他们越是这样,吉晓箐就越是觉得心绪不安。尽管她时时强迫自己往好处想,却也压不住那根敏感神经。她明白,丈夫及其一家人对她的关心照顾,全是冲着她肚子里的孩子来的,到时候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不是丈夫的骨血,她将怎样面对他们啊。

为消除心中这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吉晓箐曾几次独自跑去医院做检查,可每次医生都只有一句话:胎儿发育正常。她想进一步探问胎儿的情况,又

不知如何开口,只好作罢。她只能在心里一遍遍祈求上苍保佑不出意外,让她顺利生下一个属于丈夫的孩子……

吉晓箐在不安中等来了她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她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孩子绝对不是丈夫的骨血,而是她与那个异国客人一夜之欢的结果。

医院降生一个黑婴儿的消息,像炸开了锅。住院的病人、流动的患者,纷纷挤到婴儿保育室门口,或来到病房,想一睹那孩子以及孩子母亲的尊容,医院采取措施也难以阻止。

丈夫和婆婆早已羞辱难当,愤然离去,临走时决绝地撂下一句话:从此以后不想再看到她。就连吉晓箐的母亲,也觉得无颜见人而扔下女儿走了。吉晓箐独自躺在医院,被各种各样的目光和刺耳的议论包围着,她紧闭房门,蒙头痛哭。

几天之后,吉晓箐在医院护士的帮助下,趁夜带着孩子回到娘家。母亲虽然对她恼恨有加,但毕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还是没有把母子俩拒之门外。

单身妈妈携子凄然出走

然而,尽管吉晓箐足不出户,母亲也处处小心,把紧口风,不让外人进屋,可左右不舍还是看出了蹊跷,探得了消息。于是,吉家很快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些熟悉的人找出各种理由前来“关心”,门口经常有好奇的人探头探脑。医院里看到过那黑孩子的人,绘声绘色,到处传播,几乎

整个城区都闹得沸沸扬扬,一片嘲讽、鄙视、唾骂声……在人们的议论声中,吉晓箐完全成了一个没有尊严、毫无廉耻的风流荡妇。

吉晓箐感到了深深的自责和悔恨。为了减轻年迈的母亲因她连累而受到的羞辱,也为了避开世人的耳目求得一时清静,她带着孩子悄悄转移到城郊,住进了一亲戚家。

几个月过去了,在亲戚的照应下,吉晓箐深居简出,虽说周围安静了许多,可她心里却一刻也没能安静。产假期满,她该回单位上班了,可她哪有勇气回去?生了个黑孩子,早已成了全城人的话柄,回到单位岂不是自当靶子?即使单位接纳她,无论如何她也无颜面对同事,面对顾客。

回不了单位就做点小生意吧,她这样想。可她马上又意识到,绯闻已传遍小城的旮旮旯旯,哪里还有她摆摊设点的立足之地,更何况身边还有个不敢见人的黑孩子!

单位回不得,小城呆不下,吉晓箐思前想后,作出了痛苦的选择:远离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陌生之地谋生!念头一起,吉晓箐就伤心地哭了。她清楚,以后的日子一定是充满辛酸和艰难,可她已别无选择。于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吉晓箐抱着孩子凄然离开了小城。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文中人物为化名;谢绝转载、上网) 楚萧吟